

英汉互译导论

YING HAN HUYI
DAOLUN

安澜 刘宏

编著

YING HAN HUYI
DAOLUN



甘肃民族出版社

英汉互译导论

YING HAN HUYI
DAOLUN

安澜 刘宏

编著

导论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英汉互译导论 / 安澜, 刘宏编著. -- 兰州 :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21-1873-8

I. ①英… II. ①安… ②刘… III. ①英语—翻译
IV. ①H3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0402号

书 名: 英汉互译导论

作 者: 安 澜 刘 宏 编著

责任编辑: 桂 渝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 (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印 刷: 甘肃鑫统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9.25 插页:2

字 数: 340千

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978-7-5421-1873-8

定 价: 38.00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 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 730030 地址: 兰州市读者大道568号 网址: <http://www.gansumz.com>

投稿邮箱: 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 葛慧 联系电话: 0931-8773271 (传真) E-mail: gsm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翻译工作在当代世界是一种经常、普遍和必不可少的活动形式，促进了各国精神与物质交流。翻译工作虽为个体所承担，却是一种社会活动，一门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它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丰富的实践内涵。就前者而言，翻译经过千百年来各国翻译家的共同努力，已经在语言学、文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学、哲学和教育学等学科的基础上初步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并在具体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跨文化和语言的转换模式。就后者而言，翻译是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辩证的；翻译理论产生于翻译实践，反过来又指导实践，而实践又在不断丰富翻译理论。没有社会实践就不会有翻译理论的产生；没有翻译理论作为指导，翻译实践就会难免走弯路。

鉴于此，编者将古今中外译学界不断从实践中总结探索出来的翻译理论应用于中、英跨文化语言交流翻译实践活动。以英、汉两种语言对比分析为基础，从语言构成的最小单位——词在两种语言中的异同再上升到句子、篇章和各类文体乃至标点符号的使用等各个层面上展开两种语言异同的分析和比较；并且将最新的、实践性较强的中西翻译理论引入和融合进各个阶段的分析中，从而探究并总结出一些具体的英汉互译的翻译方法。可以说是从纵向——实践到理论再从实践出发，横向——英到汉及汉到英的一条纵横相结合的研究路线。

本书共由七章组成，在第一章的绪论里，梳理了中外翻译史，反映了翻译史各个阶段的研究成果乃至当今翻译事业的辉煌。同时也阐述了中外翻译界从古到今翻译性质、翻译标准的一个不断进步过程。

第二章到第四章是从思维的角度去具体分析翻译过程中的理解阶段；又从文本、所指、粘着和自然四个层次去谈翻译中的表达阶段；引入从古到今争论不休的直译与意译以及归化和异化两对理论来具体分析表达手段。再从英汉语言在最小单位“词”和“句子”方面的异同入手，运用各种翻译理论探讨了英汉互

译时应该注意的一些方面。

第五章的章翻译部分从中、外对语篇或篇章方面的研究理论成果出发,探讨了语言作为一个篇章有机体,是要通过衔接与连贯所产生的逻辑关系来维系的。同时进行了英汉篇章翻译大量的例证对比分析,指出如何将篇章理论中的衔接手段运用到实际的篇章翻译中去。

而第六章文体的翻译,则是从文体学的角度划分的各种各类的文体出发,具体指出科技文体、文学文体、旅游文体等等文体的特点及具体的翻译方法。

第七章是一个补充章节,主要介绍常用的翻译辅助工具,重点提到了目前网络在线翻译手段及机器翻译的研究成果。

编者通过缜密地梳理、深入浅出地分析,从英汉两种语言结构及表达方式上的不同,进行分析对比,力求全面、系统反映当今翻译理论与实践。以期帮助从事翻译实践专业人士和有志于从事翻译工作的英语初学者掌握一般的翻译理论与其相关的英汉互译方法,并将翻译理论知识自觉地用于翻译实践。

本书编写的具体分工如下:安澜负责第一、三、四、七章及所有的附录和全书的统稿和修订,刘宏负责第二、五、六章的编写工作。

编者

2011年3月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1)
1.1 中外翻译简史回顾	(1)
1.2 翻译的性质及种类	(14)
1.3 翻译的标准	(18)
1.4 对译者的基本要求	(21)
第二章 翻译的过程	(25)
2.1 正确理解的方法	(27)
2.2 恰当表达的手段	(34)
2.3 仔细校验的步骤	(47)
第三章 词汇翻译概说及技巧	(50)
3.1 词汇翻译概说	(50)
3.2 词汇翻译技巧	(62)
第四章 句子翻译概说及技巧	(106)
4.1 句子翻译概说	(106)
4.2 英汉句子互译技巧	(119)
4.3 常用句式翻译方法	(131)
第五章 篇章翻译	(161)
5.1 篇章的特点	(161)
5.2 篇章的翻译	(167)
第六章 文体的翻译	(183)
6.1 文体翻译概说	(183)
6.2 各类文体的翻译	(186)
第七章 翻译知识补充	(283)
7.1 常用的翻译工具书、软件及网站	(283)

7.2 标点符号的转换.....	(285)
后记.....	(297)
参考文献及书目.....	(298)

第一章 绪 论

1.1 中外翻译简史回顾

翻译是不同文化之间交际的桥梁。翻译史是翻译理论的一部分,是从本质上认识翻译的性质和翻译的规律。打开翻译史册,我们可以看到翻译高潮迭起,中外翻译家难以计数,翻译理论博大精深。了解中外翻译历史不仅有助于我们继承祖先们的优秀文化遗产,而且也有助于借鉴国外的先进翻译理论进而使我们能更加深入认识和发展我国的翻译事业,进而能够用经验或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活动。

1.1.1 中国翻译简史

我国的翻译事业有着 20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据有关史书记载,周朝和秦始皇时代,语言中已有了外来语,说明当时已有翻译活动了。虽然翻译开始于春秋时期,但当时多为中国不同方言间的传译。当时的诸侯国家相互之间交往就出现了翻译,当然这种翻译还谈不上是语际翻译。我国历史上出现的最早的、具有较大规模的语际翻译活动是佛经翻译。从佛经翻译至今,简单说来,我国翻译简史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或称为四次翻译高潮),第一个时期为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个时期为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第三个时期为“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以及第四个时期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具体划分为:

第一个时期为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公元 184 年—1111 年)

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成为宗教传播的重要手段。比较一致的看法认为中国真正称得上语际翻译的活动应该说是始于西汉的哀帝时期(公元前 25 年至公元前 1 年)的佛经翻译。到了东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 184 年),佛经翻译就正式开始了。佛教传播时的译经活动是我国翻译史上的第一次翻译高潮,据胡

适《白话文学史》统计，当时译经达 15000 卷以上。相比之下，佛经翻译理论的数量和分量都显轻。尽管佛经翻译理论大多是零星的、片断的，但综观前后，涉及的面是较广的。这一期间佛经翻译理论主要讨论了翻译的“难”和“失本”，翻译的各种方法（“文”“质”“厥中”），译者的修养（八备），翻译的“辞体”、“语趣”，译名问题（名实，音义同异），翻译批评和组织问题等等。

这一时期著名的译经家有：安世高、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义净、彦琮、赞宁等。从最初的来自安息（即波斯）的译者安世高翻译《安般守意经》等 30 多部佛经起，到后来有月氏人支娄迦讖（又叫娄迦讖，讖念 chen, 趁，指应验的语言或预兆）来到中国，翻译了 10 多部佛经。支娄迦讖译笔生硬，基本上是字对字、句对句地翻译，中国读者不易看懂。中国翻译界现在的直译和意译之争大概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支娄迦讖有个学生叫支亮，支亮有个弟子叫支谦。他们三人号称“三支”，是当时翻译佛经非常有名的译者。与“三支”同时从事佛经翻译的还有竺法护。他也是月氏人，是当时的佛经翻译名家，总共译了 175 部佛经，对佛经在中国的流传贡献不小。竺法护和“三支”一道被人称作月氏派。不过，这一时期的佛经翻译活动还只是民间私人事业。到了符秦时代，佛经翻译活动就组织有序了。当时主要的组织者是释道安。在他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开始了大规模的佛经翻译。由于释道安本人不懂梵文，惟恐译文失真，因此他主张严格的词对词、句对句(word for word, line for line)的直译。当时的佛经《鞞婆沙》就是按此方法从梵文译成汉语的。为了把握好译文的质量，释道安在此期间请来了著名的翻译家天竺（即印度）人鸠摩罗什。鸠氏考证了以前的佛经翻译，批评了翻译的风格，检讨了翻译的方法。他主张意译，纠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以示负责。他翻译了 300 多卷佛经文献，如《金刚经》、《法华经》、《十二门论》、《中观论》、《维摩经》等。其译文妙趣盎然，堪称当时的上乘之译作，至今仍被视为我国文学翻译的奠基石。到了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特聘印度佛教学者真谛(Paramartha, 499 年—569 年)到中国来翻译佛经。真谛在华期间共翻译了 49 部经书，其中尤以《摄大乘论》的翻译响誉华夏，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较大。从隋代(公元 590 年)到唐代，这段时间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时期。隋代历史较短，译者和译作都很少。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他是译经史上第一位中国僧人，一生翻译了佛经 23 部 100 余卷。彦琮在他撰写的《辩证论》

中总结翻译经验，提出了做好佛经翻译的8项条件：①诚心受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诚心热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②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③荃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④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⑤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⑥耽于道术，淡于名利，不欲高炫（深爱道术，淡泊名利，不想出风头）；⑦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精通梵文，熟悉正确的翻译方法，不失梵文所载的义理）；⑧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兼通中训诂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彦琮还说，“八者备矣，方是得人”。这八条说的是译者的修养问题，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彦琮以后，出现了我国古代翻译界的巨星玄奘（俗称三藏法师）。他和上述鸠摩罗什、真谛一起号称华夏三大翻译家。玄奘在唐太宗贞观二年（公元628年）从长安出发去印度取经，17年后才回国。他带回佛经657部，主持了中国古代史上规模最大、组织最为健全的译场，在19年间译出了75部佛经，共1335卷。玄奘不仅将梵文译成汉语，而且还将老子著作的一部分译成梵文。他是第一个将汉语著作向外国人介绍的中国人。玄奘所主持的译场在组织方面更为健全。据《宋高僧传》记载，唐代的翻译职司多至11种：①译主，为全场主脑，精通梵文，深广佛理，遇有疑难，能判断解决；②证义，为译主的助手，凡已译的意义与梵文有和差殊，均由他和译主商讨；③证文，或称证梵本，译主诵梵文时，由他注意原文有无讹误；④度语，根据梵文文字音改记成汉字，又称书字；⑤笔受，把录下来的梵文字音译成汉字；⑥缀文，整理译文，使之符合汉语习惯；⑦参译，既校勘原文是否有误，又用译文回证原文有无歧异；⑧刊定，因中外文体不同，故每行每节须去其芜冗重复；⑨润文，从修辞上对译文加以润饰；⑩梵呗，译文完成后，用梵文读音的法子来念唱，看音调是否协调，便于僧侣诵读；⑪监护大使，钦命大臣监阅译经。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翻译实践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标准，意即“忠实”“通顺”，直到今天仍有指导意义。他还在翻译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翻译技巧。据印度学者柏乐天和我国学者张建木的研究结果显示，玄奘运用了下列翻译技巧：①补充法（就是现在我们常说的增词法）；②省略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减词法）；③

变位法（即根据需要调整句序或词序）；④分合法（大致与现在所说分译法和合译法相同）；⑤译名假借法（即用另一种译名来改译常用的专门术语）；⑥代词还原法（即把原来的代名词译成代名词所代的名词）。这些技巧对今天的翻译实践同样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期的还有失义难陀、义净、一行、不空等译者，也都译了许多佛经。唐末无人赴印度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到了宋代，佛经翻译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在北宋的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华夏传法。宋太祖也曾在开封的太平兴国寺内兴修了译经院，专事佛经翻译。虽译场组织极其完备，译经种数几乎接近唐代，但质量却不如唐代。当时有名的僧侣译者主要有天息、法护等人。在翻译理论方面颇有贡献的要数赞宁（俗姓高，今浙江德清人）。他曾归纳了以往译经的各种情况，提出了解决翻译过程中各类矛盾的六种办法。这是对我国唐代翻译理论的继续和发展，是我国翻译论库中的宝贵财富。到了南宋，由于社会动荡等原因，佛经翻译活动已是寥寥无几，史书的记载中更是无一例翻译事件。在其后的元代，统治者曾下昭拔合恩巴、管主八等人翻译佛经，但译作只有十几部，翻译理论方面的探讨更是无从谈起。翻译事业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个时期为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及清末的西方政治思想与文学翻译（公元 1584 年—1898 年）

我国翻译史的第二个时期始于明朝后期。在明代 200 多年的历史中，佛经翻译呈现一片衰落的局面。佛经译者只有智光等一二人，译了几部经书。但到了明代万历年间直至清朝“新学”时期，我国出现了以徐光启、林纾（琴南）等为代表的介绍西欧各国科学、文学、哲学的翻译家。明万历二十九年（1602 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马窦来到北京，获准建立教堂。此后至清朝雍正年间，先后有数十名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各地活动。他们除了翻译基督教经籍之外，还与我国知识分子合作，译介了大量的西方科学著作，包括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和采矿冶金等学科，其中最著名的是利马窦与明代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与《测量法义》等。直到现在，我们所用的平面、直线等许多几何概念仍是沿用他们的。这些著作对我国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的进步起到了很大的推动

作用。

清代的林纾（字琴南）（1852年—1924年）本人不懂外文，但他和他的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翻译了184种西方文学作品，达1000万字以上。而且他的翻译速度惊人，下笔如飞、文不加点，使得许多文人才子大加赞赏。胡适说：“林纾译出的速度四倍于我。”康有为写诗云：“译才并世数严、林”（严指严复，林即指林纾）。茅盾说：“除了几个小错误，颇能表达原文。”林纾是第一个把西方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的翻译家，被称为文学翻译的始祖。他曾学过8年《汉书》、学过8年《史记》。所译小说中最著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呼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林纾的译作删减、遗漏、随意添加之处甚多，但是林纾的翻译对于中国读者了解西方文学作品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严复（字几道、又陵）（1854年—1921年）是清末另一位著名的翻译家。严复是福建侯官人，25岁到英国留学，醉心于西方资产阶级的文物制度，阅读了达尔文、赫胥黎等英法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他西洋学问造诣之高、对于西洋社会了解之深，不仅远非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可比，就是领导整个维新运动的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也都望尘莫及。严复回国后，曾随当时桐城派大师吴汝纶学古文，造诣很深。其后他潜心翻译，从光绪二十四年到宣统三年（公元1898年—1911年）这30年间他翻译了不少西方政治经济学说，如哲学方面的赫胥黎（*T.H. Huxley*）的《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经济方面的亚当·斯密（*A. Smith*）的《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律方面的孟德斯鸠（*C.L.S. Montesquieu*）的《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学方面的斯宾塞（*H. Spencer*）的《群学肆言》（*On Liberty*）、政治方面的甄克思（*E. Jenks*）的《社会通论》（*A History of Politics*）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论》，译出后在中国引起很大的震动。“物竞天择”、“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等词语流入中国，影响极大。正如蔡元培所说：“此书出后，‘优胜劣败’等成为人人的口头禅。”因此梁启超称严复为“介绍西洋哲学的第一人”，“与本国思想发生影响的第一人”。严复每译一书，都有一定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他常借西方著名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表达自己的思想。他译书往往加上许多按语，发挥自己的见解。严复“曾经查过汉

晋六朝翻译佛经的方法”（鲁迅《二心集》），在参照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翻译实践，在《天演论》（公元1898年出版）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著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作为翻译标准，这三个字的提法简明扼要、层次分明、主次突出。因此尽管人们对这三个字尤其是对“雅”字的解释存在着分歧，但许多年以来，“信、达、雅”始终没有被我国翻译界所废弃，有些翻译工作者仍然沿用这三个字作为当今的翻译标准。总之，严复对我国翻译事业是有很大贡献的。

总之，明末清初耶稣会教士与士大夫中以徐光启、利玛窦、李之藻等人为代表，主要讨论翻译的目的、功能以及迫切性。他们希望通过翻译来对西方科技“会通”，以求“超胜”。近代是救亡的时期，也是启蒙的时代。因此，这一时期的翻译理论以爱国主义为主要特点。例如：林则徐、魏源“师夷长技以智夷”，开始“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被誉为“组织翻译活动的先驱”。这之后便出现了洋务运动。本着“中学为本，西学为用”的宗旨，洋务派在输入外国工业，制造船炮的同时注意改革教育，培养外语翻译人才，引入了不少国外的科学书籍。当时最著名的翻译机构是京师的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这时候著名的译员主要有徐寿、华衡芳、李善兰、贾步纬、李凤苞等。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他们希望通过向外国学习救中国，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翻译活动，于是出现了许多译述外国作品、介绍外国经验教训的报纸和书刊。维新派中最著名的翻译家当首推严复，其次便是梁启超。严复总结了大量的实践经验，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梁启超则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在翻译领域中的主要贡献是翻译评论和对翻译史的研究。

第三个时期为“五四”运动后马列主义的引进及俄苏等新文化、新思想的翻译（公元1898年—1949年）

“五四”以后，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和社会发展的一面镜子的翻译业，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可以说“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的翻译活动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翻译活动更加

活跃，涉及的范围也更加广泛，我国翻译事业的重点开始转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文学作品。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李达翻译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其他马列主义著作。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起了很大变化。从形式来看，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白话文在译本中占了统治地位。从内容来看，我国开始了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文艺理论、苏俄及各国的进步文艺作品的大量翻译。比如《俄国共产党党章》、《共产党宣言》、《家族、私有财产及国家之起源》、《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联共党史简明教程》、《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等这些马列经典著作就是这一期的译品。这些译品成为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指南。文学方面，如俄国的普希金、莱蒙托夫、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的作品，法国作家雨果、莫泊桑的作品，也陆续被介绍进来。马列主义的输入，苏俄及其他国家进步文化的引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中国新文化的发展。

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家往往也是翻译名家。比较有成就的翻译家有成仿吾、郁达夫、曹靖云、韦素园、冯至、梁实秋、周作人、胡适、田汉、傅雷、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朱生豪等；影响最大的有鲁迅和瞿秋白。鲁迅先生 23 岁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介绍翻译知识和理论。人们称其为“研究西方文学的拓荒者”。他一生共译了 200 多部作品，字数达 300 多万，大致与其一生创作的作品相等。正如他自己所说：“左手翻译、右手写作。”鲁迅翻译的作品中包括以苏俄为主的 14 个国家的著作，如裴多菲的作品、易卜生的作品、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果戈理的《死魂灵》、法捷耶夫的《毁灭》等，这些作品对中国人民的革命起到了雪中送炭的作用。因此他比喻自己是“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从别国窃得火来，照亮中国的黑夜”。他还进行了翻译理论的研究，组织翻译工作，如组织未名社，对翻译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的译作也占本人文集的二分之一，他是马、恩、列关于文学之经典理论最早的有系统的介绍者；他还翻译了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他翻译的《海燕》，脍炙人口，同时他对翻译理论的贡献也是不小的。鲁迅是翻译工作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典型。他和瞿秋白两人关于翻译问题的通信，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他翻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和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

易解，一则保持着原文的风姿。”鲁迅竭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他针对有人所谓“与其顺而不信”而提出了“宁信而不顺”这一原则。当然，鲁迅这条原则有“矫枉必须过正”的意味，但与借此作挡箭牌的“硬译”、“死译”实无共同之处。鲁迅主张直译，是为了照顾输入新表现法和保持原作的风貌，这于借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也是丝毫无共同之处的。

这一时期的翻译事业取得了很大进步，与翻译理论的不断突破是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文学流派争论频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译论的极大发展上。如：胡适、刘半农、罗家伦、傅斯年评严复、林纾。二、译论对翻译的“主义”，即目的和社会功能的讨论越来越多。三、对译名、方法问题的讨论。四、译诗的探讨也有较大的发展。

第四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翻译事业的全面发展（公元1949年至今）

这一时期总的特点为：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翻译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品，也介绍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作品；翻译的任务有新的变化，不但要译进来，而且也肩负着译出去的任务，把我国的革命和建设经验以及我国丰富的优秀的文化遗产介绍给外国人；题材体裁更丰富多彩；操作方法更灵活便捷；翻译作品不仅质量上数量上都大大地超过了解放前任何年代；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翻译的原则比较统一了，翻译的标准逐渐走向一致；人才培养更具规模。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我国的翻译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董秋斯发表了《论翻译理论建设》一文后，中国译论开始了有目的地建立体系，开始了“转型”。期间傅雷提出的“传神”、钱钟书提出的“化境”，又为传统翻译理论增添了光辉的一页。“文革”期间，翻译工作基本停止。改革开放后，译界长期徘徊于原有的认识水平上。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谭载喜等人主张“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声日益高涨。到了1990年，刘宓庆《现代翻译理论》出版，译界公认此书为现代翻译理论体系建立的标志，传统译论也就圆满地划上了句号，而代之以科学的、成体系的现代翻译理论。翻译事业一直是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翻译理论方面在这个时期也日益充实完善。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国对外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交流空前发展,翻译事业也跨入了一个极其繁荣的阶段,迎来了第四次高潮。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以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这种“入超”地位。介绍中国 and 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些必将极大地推动我国翻译事业和翻译理论研究不断向新的高度和广度发展,使我国的国际地位逐年提高。我国翻译事业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繁荣。

总之,我国传统译学产生于六朝至宋代的佛经翻译,发展于明清之际的科技、宗教翻译,成就于五四运动,并一直延续至今,历经 2000 余年,翻译成果丰厚,名家辈出,有古代佛经(Buddhist Scripture)翻译的安清(东汉)、支娄加讫(东汉)、鸠摩罗什(符秦)、玄奘(唐)等翻译大师,还有近代文学、社科翻译的徐光启(明)、林纾(清)、严复(清)等,一直到现代的鲁迅、瞿秋白及当代傅雷、钱钟书、许渊冲等等。但译论主流基本上按“案本一求信一神似一化境”这一线索展开,特别是上世纪“五四”以后到七八十年代,基本都是围绕“直译”与“意译”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形成了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直译派和以王佐良、许渊冲等人为代表的意译派,以及“凡能直译处坚持直译,必须意译处则放手意译”的观点(王佐良)。在我国传统译论中,其中极具影响的要数近代严复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elegance)、现代鲁迅的“宁信而不顺”(Rather be faithful than smooth.)、当代傅雷的“神似”说(the notion of “Spirit A likeness”)、钱钟书的“化境”说(the notion of Sublimation)以及当今许渊冲先生的“竞赛论”(the notion of Rivalry)和“优势论”(the notion of Advantage)等等。

1.1.2 西方翻译简史

西方翻译史是在公元前 3 世纪揭开它的第一页的。从广义上说,西方最早的译作是公元前 3 世纪至 2 世纪之间,72 名犹太学者在埃及亚历山大城翻译的《圣经·旧约》,即《七十子希腊文本》;从严格的意义上说,西方的第一部译作是在约公元前 3 世纪中叶安德罗尼柯在罗马用拉丁语翻译的希腊荷马史诗《奥德塞》。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是在公元前 3 世纪问世的,因此可以说西方的翻译活动自古至今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了。它是整个西方发展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段历史也为我们积累了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我

们应当认真总结前人的翻译经验，批判地吸收前人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西方理论、方法，以便继续提高我们的翻译水平，发展我们的翻译事业。纵观全过程，西方的翻译在历史上前后曾出现过五次高潮或可分为五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西方翻译

第一次翻译高潮出现在公元前4世纪末，以翻译介绍希腊戏剧作品为主要表现形式。公元前4世纪末，盛极一时的希腊奴隶社会开始衰落，罗马逐渐强大起来。但是，当时的希腊文化仍优于罗马文化，因而对罗马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翻译介绍希腊古典作品的活动可能即始于这一时期或始于更早的时期。然而，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有文字记录的翻译确已问世。被誉为罗马文学三大鼻祖的安德罗尼柯、涅维乌斯和恩尼乌斯，以及后来的普劳图斯、泰伦斯等大文学家都用拉丁语翻译或改编荷马的史诗和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米南德等人的希腊戏剧作品。这是欧洲也是整个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翻译活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开创了翻译的局面，把古希腊文学特别是戏剧介绍到了罗马，促进了罗马文学的诞生和发展，对于罗马以至日后西方继承古希腊文学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第二阶段：中世纪初期

这次翻译高潮涌现于罗马帝国的后期至中世纪初期，是宗教性质的。其中以《圣经》翻译为主要表现形式。在西方，宗教势力历来强大而顽固，基督教教会一向敌视世俗文学，极力发展为自身服务的宗教文化。作为基督教思想来源和精神武器的《圣经》，自然成了宗教界信仰的经典。《圣经》由希伯来语和希腊语写成，必须译成拉丁语才能为罗马人所普遍接受。因此在较早时就有人将《圣经》译成拉丁语，到公元4世纪这一翻译活动达到了高潮，其结果就是出现了形形色色的译本。以哲罗姆于382年至405年翻译的《通俗拉丁文本圣经》为钦定本，标志着《圣经》翻译取得了与世俗文学翻译分庭抗礼的重要地位。尤其在罗马帝国和中世纪初期，教会在文化上取得了公断地位，《圣经》和其他宗教作品的诠释和翻译得到进一步加强。随着欧洲进入封建社会，“蛮族”建立各自的国家，宗教翻译便占有更大的市场，《圣经》被相继译成各“蛮族”的语言，有的译本甚至成为有关民族语言的第一批文学材料。